

从法兰克福到南通

□胡眸

3月23日凌晨5时,我戴着浴帽,穿着雨衣,戴好手套和口罩坐上的士,接上小伙伴以后,向法兰克福机场疾驰。

高速上车很少,我们从巴登符登堡驶入黑森州,天也亮了起来,金灿灿的晨光穿透德国早春湿冷的空气照射在地面和公路旁的树木上,形成一片片斑驳的光影,轿车穿过光影时一明一暗变换,就像我心里对旅途的紧张和不安。

七点钟到达机场T2航站楼,冲向华航的柜台,10时40分的飞机,已经有几位在排队等着柜台开放。有工作人员和我们说,只能带一个手提行李,所以得把手提包塞进箱子里。一切顺利,我和小伙伴换好登机牌,过了海关,在航站楼休息区等着安检。

不少中国人穿了整套防护服,口罩和护目镜更是标配,形成对比的是,外国地勤和安检员基本连口罩都不戴。而我的大棉衣在机场里过于厚重,浴帽和雨衣也凝结了水蒸气,我实在受不了自己像个行走的挂烫机,就把浴帽摘了,把外套脱了,然后排队安检。

在安检过程中,所有的防护措施都没有用了,防护服脱掉,帽子眼镜拿掉,鞋子脱掉,衣服脱得就剩一件,连口罩都要把里面翻给他们看一下。过了安检之后,旅客们纷纷翻出自己的装备穿戴上,专业的或者自制的面罩下一个个神情严肃,拖着箱子登机。

12个小时后,飞机稳稳地降落在桃园机场,我把行李收拾好下机,从T1乘坐小火车两分钟就到了T2航站楼。因为要等十个小时才能起飞去上海,所以迫切地想寻找一个能长时间休息的地方。费了好大劲,我和小伙伴找到了一个免费休息室。

休息室里很空旷,有可以躺下的长沙发,可以洗澡的洗浴间,还有打得很足的空调。我和小伙伴轮流洗澡,然后躺下休息。我和小伙伴在冰冷的休息室待到快14点,然后收拾好东西,吃了饭,向登机口移动。

16时开始排队登机,我把口罩手套雨衣装备好,测过体温 进入候机大厅。我本想戴上护目镜,但戴上以后根本无法看路,只能塞在包里登机入座之后戴。

我坐在中间四座的靠走廊位置,旁边是一家三口,他们只戴了口罩,一家人中的爸爸拿着免洗洗手液紧张地问家人有没有洗手。而我戴上晕晕乎乎的护目镜,准备闭目养神。台北到上海也就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飞到一半时,空姐给乘客发健康申报表,上面要填过去14天去过哪些地方,用过什么药,有没有和患者接触过,有没有什么症状之类。飞机因为气流颠簸得厉害,护目镜勒得我脑供血不足,我感到一阵阵恶汗,于是就在“恶心”和“腹痛”上划勾。

18时20分左右,飞机降落在浦东机场。空姐让所有人在座位上不要走动,她叫到名字的下机,先是一些外籍旅客,然后是台湾旅客。我是第二批下飞机的,拎着箱子踉跄地走下楼梯,奔上摆渡车,塞满一车子人之后缓缓启动,警车和救护车在一旁护送,20点40分左右,我

终于进入浦东机场的航站楼。

眼前是排了十几米的等待检查健康申报表的旅客,在等待中,我已经习惯了不透气的FFP2口罩。大概排了一个半小时,终于到了交健康申报表的地方。像招聘会一样,一共有八个卡位,有的坐一个人,有的坐两个人,每个卡位的工作人员都是防护服穿得严严实实。工作人员认真看了我的表,确认了行程,问清了我现在没有症状以后,在护照和健康申报表上各贴了一个小黄标,让我拿去复印。在我填写修改的时候,听到工作人员闲聊,之后还有将近一千个人在等待中。这些海关的工作人员必须一个一个检查才能放行,这两天都是忙到四五点钟。

拿好复印件、原件、护照,再一个一个经过两道测温门,又到了一个个柜台,他们再一次确认了我的申报表,收走原件,让我在“症状消失”上面签名,才把我放走。没走两三步又是一道检查证件的关卡,然后是分流到达和转机的关卡,终于走到了入关的地方。平日里从下飞机到入关只需要十几二十分钟,而现在用了将近两个小时;护照自助查验入关也变成了海关人工查验。入关以后,我从摆成一排的行李箱中翻出我的箱子,从无申报通道走出出口。

出口外面原来是接机人们等待的地方,现在被建筑板划分成了不同的区域,当我顺着“江苏”的牌子走到等待区时,已经差不多22时30分。大家在接待处填了江苏的健康表,等待上车。我的口罩仿佛和脸融为一体,不敢吃也不敢喝,抱着包,捏好证件,准备好了被叫到就迅速走人。

23时多,经过了再一次检查证件,我终于坐上了驶向昆山花桥会展中心的大巴,大概两个小时左右到了昆山分流出口。

我们的大巴等了二十分钟,才驶入场馆;随车人员下车以后,一量体温,核实目的地,再放到等待区域。

南通那一块连我只有三个人,我赶紧把厚外套穿上,把防护口罩换成医用口罩,稍稍喝了点水,感觉身体有了一丝暖意,再坐下歇着。没过多久,南通的工作人员就把我和另外两位带到等待的大巴处,放行李上车。熟悉的飞鹤公交裹挟着更熟悉的深夜冷风,带着一车劳累的南通人踏上回家的路。

大概在三点半左右,大巴停在小海监测点,车上所有人都要下来做血检和咽拭子,然后再分流到各个区。

从小海出来已经接近五点了,长时间的寒冷和劳累让神经变得麻木,我逐渐感受不到抽搐的胃,疼痛的腿,和打着喷嚏昏昏沉沉的脑子。晨光洒落,沿途的早餐店准备开门,早起外出的老大爷裹紧了棉袄和帽子,我的旅途和黑夜一起结束了,在早晨六点,我到达了隔离点。

进门先把衣服脱掉,再把所有手提包和手提箱里的物品进行消杀,再去洗澡。酒店设施齐全,条件很好,伙食也很不错,家里人送来了一箱补给,我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地想,从这一刻,我14天隔离生活要开始了。

走马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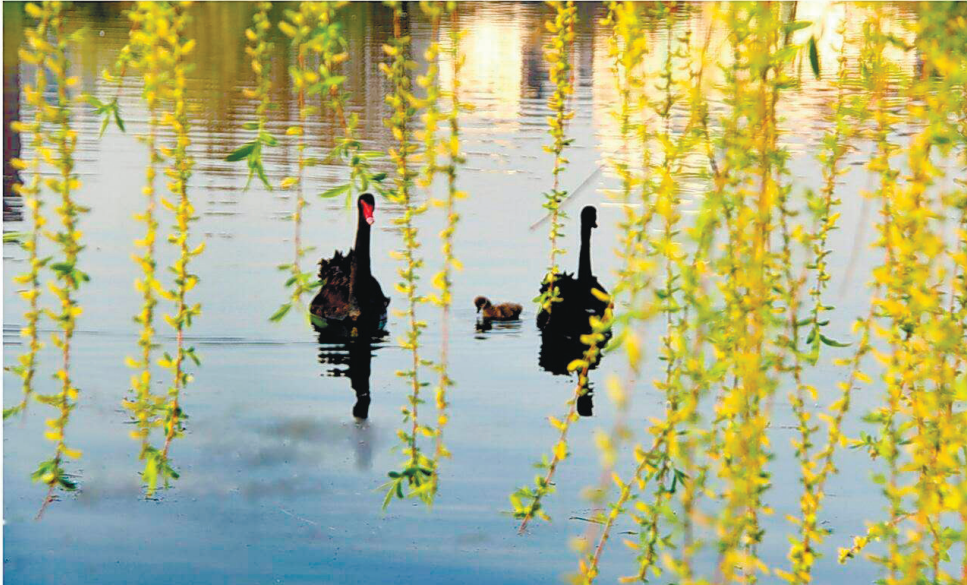
紫琅诗会

清明赋祭

□郭齐康

荆楚大疫,庚子春瘟,冠毒猖獗,九衢三镇。龟蛇鸣咽,黄鹤吸声,千村萧疏,百里新坟。痛定思痛,决不沉沦,武汉好汉,自律封城。全国同心,倾力施赈,

主席令下,调动三军。白衣执甲,火雷布阵。中西并重,妙手回春。泱泱古国,福佑天顺,共产党人,定海神针。历经万劫,炎黄子孙,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一帘幽梦

沈媛媛

玉兰一瓣

托起希望的“定海神针”

□白万清

苍松耸翠虽无语,日里梦里忆故人。

清明时节,我想起了三位曾担任任港乡党委书记的王兆良、张文佩、魏志晖。然而,岁月的尘埃却一点一点地往他们的身躯上覆盖,三位“领头雁”都带着对任港乡的无限热忱和眷恋,带着对事业的向往和执着,带着对未来的追求和渴望,生命的火把已从人间熄灭了。

特别是2019年10月24日《南通日报》的一则“讣告”令人潸然:“中共党员、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政府原处级督导员王兆良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9年10月22日20时52分逝世,享年72岁……”

不知是天意还是巧合,这正应了王兆良自己的一句谶语:“人的生命如同一支蜡烛,有的燃烧快些,有的慢些,我追求的是光和热,而不是燃烧时间的长短。”

72岁,还是热血沸腾的人生段啊!岁月的风霜雨雪,更替着人的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留下的都会无言地沉淀于岁月深处。

我不禁想起了《三国演义》的开篇之词,“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咀嚼着这些深沉而又严峻的字眼,我的心胸如同碧水澄莹。

人生一世弹指间,莫说读破万卷书,只要真读懂了这几十个字的《临江仙》,人生也该醒悟了,就能多出几分不乏虔诚的真心和真情,少了几许虚荣的自艾和浮躁。也许不那么拼死拚活地去争去挤而误入歧途。然后,清心寡欲,宁静淡泊地去倾情为社会多做一些“后人钦敬”的好事,成为人生档案里的页页感动,这不就是心宽即福嘛!

追求,是点燃美好人生的长明灯。王兆良始终保持着一种长盛不衰的追求精神,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历久弥坚。在他 72个春秋的人生长河中,镶嵌着一颗颗宝石一样晶莹闪光的故事。

王兆良读过穆青的名篇《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读得他眼里噙满了激动的泪花。他对焦裕禄自是无限敬慕,把他当成了镜子,常照自己。

自此以后,“卷开千帆过,书中日月长”成了他的人生信条。他始终认为,一个人若能在书籍中阅尽种种人生,就会用一种超然物外的达观心态对付所有的艰难曲折。

回望1991年,时任任港乡党委书记的王兆良、乡长张志刚,带领千群把全乡的各项工作搞得风生水起,位列全区前茅。然而,新的区划调整出台,节制闸以北划归永兴乡管辖,任港乡的半壁河

山没有了。

面对突发的难题,王兆良的人生之犁将留下怎样的轨迹?

王兆良自感一颗心像在磨扇底下压着,连说话也有点“缺苗断垅”似的。这时,他又一次复读穆青的文章,焦裕禄的形象尤现眼前,好像长夜里看到了曙光。

“身上的肉可以掉10斤20斤,可任港乡的工作一分一秒都不能掉队!”“有多大能耐,我都使出来。只要有老百姓撑腰,什么困难都能踩在脚下……”他向党发誓言,字字金响玉振,句句掷地有声,使人感到仿佛从沸腾的梦中惊醒。

“说都说了,剩下的就是干!”他信心满满地说。

这期间,他日夜奋战在第一线,全乡上下人气火旺,大办村办企业和家庭副业扬起了气势磅礴的潮头,还和辖区内的十多家企、事业单位办起了联营厂,到处呈现了蓬勃发展的喜人景象。

王兆良在庆功会上并没有欣喜若狂。他两眼炯炯,话语铿锵:“任港乡发生了巨变,算是爬上了一道坎,迈过了一道梁,趟越了一条河,可还有九曲十八弯的路在后头呢!”

“王书记哎,你的创业门儿经真大呀!”庆功会后,有人向他点赞。

“没什么门儿经呐,我只晓得,遇到难题,坚持就是胜利!”他随口应答,继而深有感触地说:“即使面对泰山压顶的难题,决不能等看到希望再坚持,而是要尽生命之力坚持了才能看到希望。”每次听他的讲话都是一次丰盛的思想盛宴。

他办事一步一个脚印,从来不作秀,走过场。他一直认为,什么东西一形式起来,离内容就远了。

春秋轮转。虽随日月升沉渐成尘封的往事离我们越来越久远,而历尽沧桑、阅世深远的老党委书记魏志晖,更是早已和他阴阳两隔,但任港乡老百姓对他依然是思绪萦怀。

因为他生前心里装着的,永远是老百姓。那年农历十一月,农村冬季积肥正开展得如火如荼。魏志晖带领一班人来战胜村驻队蹲点,脚跟还未站稳,就有人惊奇地感叹:“蹲点咋不拣个尖子队?要是搞不出名堂来,面子往哪搁?”

“多积肥多增产,还谈什么面子呀,我们考虑的是老百姓的肚子,再说,称称斤两,面子能当饭吃?”他边说边打好地铺,而后乘着呼呼的西北风急匆匆直奔积肥工地。

羊肠般的土路,坑坑洼洼,雨一下,滑溜溜的。他双目高度近视,佩戴的镜片超过800度。加之,个儿高高的,走在路上像在荡船。

“魏书记啊,天气冷得滴水成冰,你是‘老革命’,就不要赤脚下塘了!”几位老农心疼地劝道。

“老革命也不能张果老卖寿,倚老卖老呀,更不能吃老本,在这里我

和大家都是挑泥工,何来不能赤脚下塘?”他双眸一闪,说出的话来,就是那么朴实、干脆到难以追问。

他毅然决然地脱掉鞋袜,挑起了泥络子,走在泥泞的小路上,深一脚,浅一脚,任寒风刀一样割着肌肉。为了防止滑倒,那脚趾更是用尽了力气,死命地深深地扣进泥里……他那一双赤脚永远像锚一样牢牢地扎在我记忆的深处。“指挥不在第一现场,等于空手指挥。”他那爽朗的声音常响在人们的耳旁。

他们就是这样身先士卒地为老百姓的未来谋划着新的希望。未来在哪里?未来不在远方,而在脚下。因为脚下即是走向未来的起点。

张文佩,正是这起点上的一枚“定海神针”,他觉得,做事业的“定海神针”是无上的荣光,更是责任和担当。“我这一辈子风雨兼程50多年,从嘴上没毛的年轻时代到现在满头披霜离休,从来没有闲度过秋月春风,心中始终放着党的事业。”这是他生前在离休当天,回望自己的人生旅程时,没有一点造作的肺腑之言。这也是他人生的写照。

张文佩十五六岁时,抗日的烽火正在他的家乡燃起。

“中国共产党人的宗旨就是要为人民群众谋幸福而奋斗终生……”那天,银色的月光下,身为地党支部成员的舅舅戴礼泉正在竹林深处,为他点燃革命信仰的心灯。

“为了打败日本鬼子,我张文佩就是粉身碎骨也不后退一步!”他激动地和舅舅拥抱在一起。

有一次,他向城里传送天生港一带的碉堡布防图,“岗哨”从蛇信子似的灯光里发现了他蠕动着的身影,立刻枪声四起,他跳进冰冻的河里躲在沟坎的斜洞里……当夜,他发高烧,卧床了半个多月,病得死去活来。

1949年2月,南通解放。刚17岁的他于当年5月担任九圩乡乡长,由于个子矮小、瘦削,人们戏称他为“伢儿乡长”。之后,他还在东风、唐闸、港闸等地工作。1968年又调任任港乡党委副书记、书记,直到1988年离休。

“历史给我们这么好的机遇,我们不抓住,就对不起党和人民!”他说。汗水浸透处,才是收获地。1985年,任港乡实现了工业产值超亿元,利润、税收都超千万元的乡。南通独此一家,江北也是首屈一指。时任南通市委书记朱劭、市长张佑才等都亲临庆功会现场,祝贺他为南通市争了光、添了彩。

王兆良、张文佩、魏志晖像泉水一样,流淌着清激的感情,播洒在任港乡的每一寸土地上;像荷花一样,绽放纯洁的思想,让人汲取人生的信仰和力量。

光光溜溜来潇潇洒洒活,坦坦荡荡干从从容容走,那是一个完整的大写“人”字。